实在的分量 人民的情怀

□忽培元

研究路遥本身体现了我们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关于文艺的《讲话》中最重要的精神，即文学艺术要担当起时代重任，塑造时代英雄。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树立雄心壮志，肩负起时代使命与责任。路遥在改革开放中，用自己的作品和他的创造，呕心沥血的牺牲奉献，为我们打造了一部影响深远的具有史诗意义的好作品——《平凡的世界》。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回过头看《平凡的世界》，其艺术上也有粗糙的地方，但它毕竟属于一个时期的经典。更确切地讲，它是属于时代的，作家和时代同步，即属于永恒。因为他完成了一个作家在这个时代顶天立地的个体劳作，就像陕北老百姓从山上背着颗子回来了，一年劳动的成果，不管背的是豆子也好、谷子也好、糜子也好，那是真颗子，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跟路遥很熟，是延大校友，也是好友。他最后把三本自存的签名本精装《平凡的世界》留给我了。我对他很了解，路遥不是一个从一开始拿起笔就想成为作家的人，远远不是。路遥是一个想当干部的人，想成为改造和引导推动时代变革的人，他是有大想法大情怀的。所以他的胸襟、眼界和思路都较一般作家开阔，思考也更深刻。但后来由于时代的变迁，各种各样的原因把他筛选到了文学的领域，作家的行列。换句话说，只剩下这一条路了，他义无反顾，非走不可。怎么办？路遥是一个务实而智慧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于是全身心地放在文学创作上。所以他首先完成的不是文学的积累，而是思想的积累，是对这个时代的思想、情感和责任心的聚集，这是路遥和一些作家不一样的重要前提。当然还有我们陕西作家的传统。比如说老一辈的作家，柯仲平、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等，更有柳青，他们首先是革命家，是战士、共产党员，到延安参加革命，然后才拿起笔写作，成为作家的。比如杜鹏程，把他分配在边区师范学习，完了让他当教师，后又当了随军记者，在这个时候拿起笔，他首先是革命者、战士，然后进入文学领域耕耘。所以他们的理想信念和情怀都非同寻常，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关注的问题和格局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心里的标杆也不一样的。我一次跟路遥开玩笑讲，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写小说吗？他说我是想当省长，竞选省长，治理一个省，田福军就是他当时的那种理想的化身。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上初中他也参加了运动，因为他有对真善美的选择和把握，有独立思想，他是保守派，他把县委书记藏起来保护。《惊心动魄的一幕》实际上是他的一段真实生活经历，批判会以后，他把县委书记偷着藏起来。所以路遥是这样的人，弥漫在他作品里边的东西，不是小情小调，也不是精雕细刻的一幅画，是一种社会大历史的画面，视野开阔，不是一个普通农民、农村青年所能够完成的思考。 第三点，为什么他逆潮流而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路遥也和我谈过，说他这个时候非常难，《人生》完成以后他有一种危机感，好多作家都写出了有影响的长篇，他很紧张，他说每次写长文章都很紧张，怕完不成。最后为什么他选择了现实主义，我认为这是他的生活和积累决定的。他的人生令他具备这样的特质，而不是他的刻意选择，是自然形成的。包括他厚重深刻的艺术风格，也是如此。因为陕北的山就是貌似质朴，但厚重深刻。现在看《平凡的世界》，跟陕北的山是一回事。表面看，它都是黄土山，没有什么稀奇，一看平凡得很，也不峻拔，没有哪个地方爬不上去。只要上了一座山，每个山都可以转到。路遥的作品就是这样。但是仔细看，在黄土下面掩盖的岩石，非常坚硬、厚重。这是陕北的山，表面上平凡、柔和，内在像钢铁，有时候修路一破开，露出来了，这就是陕北的山，典型环境的特点。因此造就了路遥的艺术形象，就是这么一种表面朴素平凡，内在坚硬、分量很重，路遥有一句话说，金盆打烂了，分量还在。就体现了他自己要这种实在的分量，哪怕打烂了，仍然值钱。比瓷盆子还要值钱。他的作品之所以现在还能打动人，正在于耐读。第四点，他的真实性其中包含着人民情怀与对土地情感，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敬仰热爱。这些组成了他永恒的被人热爱的艺术形象。

《平凡的世界》何以常销不衰？

——出版三十年后的再观察

□白 烨

1988年5月，长篇小说三部曲《平凡的世界》完成全部写作，并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于今整整30年。

1992年11月，作家路遥在42岁上因病不幸逝世，迄今整整26年。

《平凡的世界》在小说联播和图书重印上创造了当代文学作品前所罕有的两个纪录。《平凡的世界》当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联播”节目播出后，又在陕西、云南、新疆、内蒙古等省区台重播，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测算，《平凡的世界》当年的直接听众达到了3亿人之多。在图书出版方面，据现有的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数字统计，《平凡的世界》每年重印100万套，累计印数已达1700万套。而且，在近年一些高校图书馆学生借阅文学图书的数字统计中，《平凡的世界》一直在排名中名列第一。这样的现象都集中地发生于一部作品，并不多见，也很不寻常，而这样的现象，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平凡的世界》何以在30年来一直常销不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为何对《平凡的世界》如此喜欢？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长久地吸引人，不断地打动人，内在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把握时代、掌控命运的主题书写中，为历史留影，为时代放歌。

《平凡的世界》主要描写的，是1975年至1985年间的农村生活场景，这个时候，正是由“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过渡时期。作品里两位主要人物孙少安、孙少平，其青春成长的辛苦与甜蜜，人生历程的顺遂与坎坷，都跟当时时代氛围、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故事开场之时，还处于“文革”的后期，那个时候，穷困与极左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无论是上学读书，还是在家务农，都到处碰壁，活得自卑而苟且。而徐徐吹来改革的春风之后，孙少安由搞承包，办砖厂，逐步走向了脱贫致富之路；而孙少平则毅然离开农村，到外边去闯荡，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可以说，少安、少平的成长进步，都跟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密切相关。时代的命运转折，给他们提供了改变个人命运的机遇，他们紧紧抓住时运更变的难得契机，使自我命运的改变成为可能，变成现实。由此，作品以农村青年在时代转折时期的人生际遇和成长故事，描绘了当代农村青年的事业打拼与人生奋斗，也歌颂了给他们提供机遇，成全他们的理想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也告诉人们，个人不是孤立的，命运也不只是个人的，个人与社会相辅相成，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

第二，以小人物在困境中迎难而上的奋斗故事，为普通人造影，为奋进者扬帆。

《平凡的世界》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但都没有什么大人物，主要人物少安、少平、润叶、晓霞等，都是农村小青年、乡间普通人，而且也很难说他们是成功者，与其说他们是成功者，不如说他们是奋斗者，他们为自己的命运而拼搏，为家乡的变革而奋斗。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有形无形的障碍与掣肘，使得前行的路上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少安不甘心混吃大锅饭，找到分组包产的致富路子，却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倾向被不断打压；当政策放宽，能够大干的时候，他办的砖厂却因“二把刀”师傅烧坏了窑，赔了大把的钱，他几乎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而想凭靠自己的力量去外边闯世界的少平，生活同样极不顺遂，无论是在黄原打工，还是到铜城当矿工，一直都是在生活的最底层挣扎，糊口和养家始终是困扰着他的一道难题。命运的苦难折磨人，命运的苦难也成就人。人生不能逃避苦难，人生也不能没有进取，重要的是要有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和战胜命运乖蹇的魄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些很难做到，但也能够做到。路遥通过孙少安、孙少平的故事告诉人们的这些人生哲理，以及作品随处可见的人生感言，是作品最能打动人、也最能激励人的部分。而这对于那些正处于青春成长时期，正在应对生活难题的青年，都会带来一定的触动，给予他们诸多的启迪，以及极大的助益。

第三，以对不完美爱情也是爱情的如实状写，为爱情把脉。

《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孙少平等农村青年男女，在他们青春成长与事业打拼中，爱情不仅相随相伴，而且是他们认识人生的重要途径，整体人生的重要构成。有意味的是，作者路遥抑制住常人易有的模糊的善意与廉价的同情，以真率的态度和强劲的笔力，写出了每一个人爱情的不顺遂，每一对男女婚恋的不完美。少安与女同学田润叶倾心相恋，但因门不当、户不对，不得不忍痛割爱另娶了山西姑娘贺秀莲。而田润叶在少安结婚之后，也在父母的包办下嫁给原本不爱的李向前，在婚姻的幌子下过着单身的日子。少平挚爱的聪慧过人的、总能给他温暖和力量的田晓霞却在一次采访活动中因公殉职，使得少平只能在无尽的思念中寄托爱恋。在爱情与婚恋上，双水村的青年男女们，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个个都有难走的路。但不顺遂的爱情，不如意的婚姻，就该一概否定吗？当然不是。不完美的爱，柏拉图式的爱，单相思的爱，其实都是现实一种，爱恋一种。经由这些残缺不全的爱情描写，作者传达出的，是一种更务实的认知，更豁达的心态，那就是有爱便好，爱过就好。这些爱情故事里的意蕴，都可以给现实中的人们或者提供借镜，或者提供参照。

还有一个不能不看到的重要方面，那就是《平凡的世界》采用了直面社会现实和人们心理现实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并把种种技巧化合于日常生活的自然叙事，令人读来如同进入生活本身，亲切自然，没有间隔感与距离感。这种写法，这种趣味，正好适应了读者大众的阅读口味与审美需求。由此，我想到法国文学史家朗松解说大众喜欢的作品的原因，是因为“写出了人人共有的情感，而不是艺术形式的别出心裁”。是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的世界》也信而有证地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力作确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现实主义文学仍有充沛而强盛的生命力。

在改革开放的大视野中看路遥

□程光炜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路遥逝世27年。在改革开放的整体视野里看路遥及其创作，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首先，没有改革开放营造的鼓励个人奋斗的大环境，不可能有路遥这样的作家。与此同时，也因为有路遥创作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优秀作品，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改革开放历史情境中，一个普通人如何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最终实现人生理想的内涵。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不只浓缩了千百万个回乡青年农民的“心灵史”，也是我们这些当年知青的“心灵史”。而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形象，则浓缩了90年代后市场经济全面铺开，千百万个从农村涌进城市的打工者艰辛不屈的生活意志。这两个人物，是80年代和90年代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的主人公。如果说，新时期文学40年一直缺少能够贯穿始终的文学主人公，我认为在通过奋斗从底层上升到社会中上层的意义上，路遥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是可以作为文学主人公而铭刻在历史丰碑之上的。

其次，这是不是说，路遥的思想和文学追求，是改革开放大视野中文学创作的唯一追求呢？我认为不是。如果这样看路遥，就把历史的宏大场面狭窄化了，正如黑格尔在其《哲学史演讲录》所指出的，这不是“全部的历史”，而只是“历史的局部”，虽然这个局部在最近40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可能是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分。改革开放这幕历史壮剧中，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它的内涵是极其多元和丰富的，既有鼓励人奋斗向上的思想激情，也有宽容和理解每个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清晰思路，既有外在的奋斗史，也有潜意识的内心活动。比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反映青年人在历史变革之际的言语行为，同样折射出改革开放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意义。所以，如果只以路遥为标准，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按照这个路子去从事文学创作，我们今天看到的极其壮丽、宏富的新时期文学40年的恢弘图景就不存在了。我的意思是，路遥大部分的作品，反映的都是普通人奋斗的过程及其命运感。而另外一些作家，也包括很多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则反映的是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对于历史巨变的理解，描画的是他们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史。

第三，我这样说，不是要矮化路遥对于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的意义，相反，我是要强调，他的作品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他的创作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不仅不能低估，也许还能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帮助我们思考这40年文学的得与失。我有一个粗浅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之后，当代文学迅速提出“寻根”、“先锋”的口号，对于鼓励文学探索，尤其是文学形式的探索、实验，将文学创作的审美水平、艺术技巧摆脱过去落后的阶段，跟上世界文学发展的脚步，意义是非常巨大的。然而这样一来，像路遥等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作家，都被历史匆匆掠过了，成为新的文学场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文学现象。现在很多作家，都把文学创作的技巧看得很重要，习惯用卡夫卡、马尔克斯、卡佛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作为小说创作的标尺。这在当代作家中，成为一个很普遍的风气，批评家也大多跟着这种风气跑。相比之下，关注人的命运，揭示大历史下人生的悲欢，尤其是能够概括这40年时代风云、触碰读者内心世界的作品，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的。另外，很多作家特别喜欢谈文学的“隐喻”，所谓“寓言式写作”，这个到底对不对呢？至少我现在看不出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究竟有什么好处。在这个背景中，你再来读《人生》《平凡的世界》，虽然感到它们的创作技巧并不是很高，然而它们与你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对话性。我认为，不能仅仅以知识精英的文学趣味来判断文学的是非，还应该留意普通读者怎么看。比如，为什么迄今为止的新时期作家，路遥作品的发行量是最大的呢？仅仅因为它们是励志的、通俗的小说类型吗？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也因为如此，新时期很多作家笔下都没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文学主人公，而高加林、孙少平却是令很多读者都难以忘怀的文学主人公，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路遥小说中的奋斗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其次，不能以路遥为是非，贬低了其他文学探索和创作的价值；最后，我们将路遥现象扳过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去重估新时期文学40年的是是非非、得失功过，便会发现，路遥不仅对改革开放的历史道路，对新时期文学40年的历史道路，都是一个含义深远的存在。今天看，他并没有被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学新潮冲击荡涤得了无踪影，当这些文学大潮过去之后，他反而很像长江三峡惊涛骇浪中时起时伏的黑色的礁石，一直都耸立在那里。

这就是路遥之于新时期文学，路遥之于我们这些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意义。

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路遥对中国当代

□段建军

路遥的创作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而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是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的。路遥从《惊心动魄的一幕》，经《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一直坚持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他文学创作的命运，也与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坛的命运而起伏，与大多数人民的艺术需要相关联。

路遥对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个贡献是，发现了“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特殊空间。用自己的笔在其中耕耘，用自己的创作实绩，将其变成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城乡交叉地带是一个特殊的生存空间，主要分布于学校、工厂和部队，以及城乡接合部的市场。这里生存着各种相互区别的异质存在者，比如文盲和知识分子，乡民和市民，少数民族与汉族等，他们带着各自鲜明的特点进行交往，因此，能够形成鲜明的对话关系，能碰出强烈的思想火花，能补充每一个体思想的短板，能激发每一个体奋发有为。

陕北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交叉地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又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的交叉，赋予它一个新特色——城乡村交叉地带。交叉地带就是交流交往地带。生活在闭塞地方的人因为缺乏交流交往而孤陋寡闻死气沉沉，生活在交叉地带的人，在交流交往中见多识广充满活力。民族在闭关自守中死水一潭，在交流交往中进步发展。与游牧民交往，给陕北人的生命中注入了定居民族少有的浪漫情怀；与京城知青交往，激活了乡野人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

路遥出生在陕北，主要的人生经历，是在城乡交叉地带度过的。他曾经在县城上过中学，乡下学生与城里学生的交往对比，对他后来的人生规划人生理想影响甚大。回乡之后，他也是一个知识青年，在与下乡知青的交往中，更加强化了他对城乡差别的认识。他没有抱怨自己生不逢地，而是用积极的心态来感恩这种交叉地带的交往体验，这种交往体验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认识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他努力奋斗和争取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激发他改变旧的生活方式，积极奔向新生活的动力。路遥把这种感受变成一种艺术发现，化为一部部小说文本，让读者去欣赏发生在这个特殊空间中的人生况味，激发读者奋斗向上的正能量。

路遥的这一艺术发现，不仅反映了中国城乡交叉地带，也反映了城市里的交叉地带以及中国与别国交叉地带有志青年的共同志向，更把中国当代文学带到了世界文学的富矿地带。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文学史，就会看到，一切真正的大作家都在交叉地带发掘故事，描写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托尔斯泰等无一例外。他们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黑与白、贫与富、上与下的交叉地带，讲述那里差异交往中所发生的人生故事，挖掘差异交往过程中人们内心深处生生不息的本真追求，进而引发人们对这一特殊空间生存者本真生命的哲思。

路遥把城乡交叉地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环境来描写，呈现当时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开放与文化上的抑制之间的矛盾冲突。它所反映的底层百姓进城难，发展难，实现人生价值与尊严难的问题，却是那个时代从乡村到城市所有底层青年普遍的人生状况。主人公高加林要求打开城门，让有志青年在城市的平台上散发热量，为国家的发展贡献才华的诉求，也是那个时代所有青年的共同诉求。

路遥给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二个贡献是，在现代主义思潮弥漫文学界和评论界的时候，依然为了满足大多数人民的艺术需要，勇敢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写成了长篇力作《平凡的世界》，激发引导了几代大中学生和打工族奋斗向上。

路遥对当时的中国文学思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很多的新潮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文艺理论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学表现样式。“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

路遥认为，文学作品是用来与读者交流人生感受及思想感情的，因此，评判一种文学样式是否过时，或者是否新颖，就必须把目光投向交流对象——读者大众。读者如果愿意与这种样式的作品建立对话交流关系，分享作品中的感受与感情，就说明这种文学样式还未过时。尤其是广大的读者愿意与这种文学样式建立对话交流关系，这种文学样式就更有存在的必要。批评家不顾对话对象的要求和愿望，以启蒙者的姿态，教育作家和大众应当如何如何，只会把所谓的启蒙话语变成批评精英们的自娱自乐。

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现实，关怀读者大众艺术需求的精神向度。它要求作家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关怀劳动人民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前途与命运。如果“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

路遥在有生之年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同时肯定现代主义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借鉴价值。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的不断繁荣与发展，正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需求基础上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结果，缺少或偏废了任何一方，都不会取得今天这样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与路遥的创作道路”研讨会发言选登